

偶像的黄昏：论《神箭》中伊祖鲁的身份危机与伦理选择

Twilight of the Idol: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Ethical Choice of Ezeulu in *Arrow of God*

黄 晖 (Huang Hui)

内容摘要：阿契贝的小说创作记录了 20 世纪非洲部族社会的“秘史”。作家侧重于从人物的伦理身份出发，通过展现其被疏离的过程，考察部族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乡村伦理的衰微，进而折射出部族政治和社会机制的变化。本文拟将《神箭》与非洲处于殖民主义时期的伦理、宗教、法律互为参照，通过文本细读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考察，以“身份危机”切入，分析伊祖鲁的伦理悲剧，以期阐明该作品所隐含的非洲部族社会的伦理机制。

关键词：《神箭》；身份危机；伦理选择；伦理悲剧

作者简介：黄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非洲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批号：13&ZD128】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洲文学史》【项目批号：17FWW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Identity Crisis and Ethical Choice of Ezeulu in *Arrow of God*

Abstract: The novels of Chinua Achebe keep a record of secret history of African clan in the 20th century. He investigates the changes of the clan especially the decline of rural ethics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ethical identity, thus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clan politics and social mechanism. This article reads Achebe's novel agains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ethics, religion and law when Africa was under the colonial force.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ext, the article analyzes Ezeulu's ethical trage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crisis, thus illuminates the ethical mechanism of African clan.

Key words: *Arrow of God*; identity crisis; ethical choice; ethical tragedy

Author: Huang Hu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mail: huanghui@188.com).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 (Chinua Achebe, 1930–2013) 是尼日利亚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神箭》是阿契贝“尼日利亚四部曲”中的第三部, 自 1964 年出版后深受学术界的好评, 有批评家认为它是“最具有神秘色彩、最富有文化内涵的非洲小说”(Wren105), 小说讲述优鲁神大祭司伊祖鲁因无法协调与殖民者、与族人以及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走向疯癫的故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殖民批评方面, 从殖民矛盾、种族意识和宗教文化的视角解读文本,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神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迄今为止, 国内外评论界还没有学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解读和剖析该文本, 故笔者尝试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深入分析男主人公伊祖鲁所处的伦理环境, 通过对他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辨析和考量, 来阐释该作品所隐含的非洲社会的伦理机制。

一、半神半人：伊祖鲁的身份危机

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阿契贝那里, 所谓的“秘史”不是村庄史或地域史, 而是一个时代之中的人的伦理身份的裂变与重塑。也就是说, 从人的身份变迁来折射社会的变迁, 聚焦于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 82) 而淡化具体的历史事件。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 聂珍钊教授指出: “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263), “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 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 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265)。人物的伦理身份是维系其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纽带, 彰显出人物对道德规范的遵守。《神箭》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阿契贝对社会文化结构和人物心理的认识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层面, 从而能够以错综复杂的伦理身份来把握人物的精神面相。

小说的主人公伊祖鲁是乌姆阿若部族最高神优鲁神的大祭司, 具有神和人的双重伦理身份: 作为神的那一半, 在重要的节庆日要主持六个村子的祭祀活动, 负责替村民和神灵沟通, 为神灵献祭, 为村民祈福; 作为人的那一半则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要娶妻生子, 要耕耘劳作。这种神性和人性的双重身份导致他很难区分自己所行使的权利是他作为人所具有的, 还是他作为神所具有的。他有时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权利可能是虚幻的, 他只不过是神和部族之间的一个中介和调解人而已, 其实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威, “是的, 他为南瓜叶节和新木薯节命名; 然而他无法选择日子。他不过是守护人而已。他的权力和一个孩子对山羊的所谓权力没有什么不同”(4)¹。然而他固执高傲的性格又不允许他这样来怀疑自己, “不! 优鲁神的大祭司不只如此, 绝不应该只是如此。假如他拒绝为那天命名, 便不会有节日——没有种植,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阿契贝《神箭》(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 年)。下文只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没有收获”（4）。伊祖鲁一心想把个人的愿望和神的意志统一起来，借助神谕的力量，维护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

然而有一年，发生了土地纠纷这个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事件，并引发乌姆阿若要与另一个部族奥克帕瑞发动战争。之所以说这一事件具有现代性意义，是因为两点：第一，它把外来入侵者白人殖民当局牵涉进来；第二，它严重挑战了优鲁神的权威。起初，伊祖鲁告诫村民不要发动这次战争，但大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执意挑起来战争，伊祖鲁认为这是对自己权威的蔑视，对村民的违抗行为极为不满。结果战争持续了五天，双方相持不下，殖民当局出面干涉并收缴了双方的武器。在殖民当局调查这土地纠纷的过程中，伊祖鲁提供了不利于自己部族的证词，说那块具有纠纷的土地本来就是奥克帕瑞送给乌姆阿若的，结果那块地被判给了奥克帕瑞，并由此导致了伊祖鲁的身份危机，“一场现代意义的土地纠纷事件在乌姆阿若导致了对优鲁神的怀疑，并动摇了部族的历史久远的宗教根基”（蒋晖 65）。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伊博族人传统的社会运作机制中，大祭司的意见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部族的法律。一旦大祭司抬出祖训，许多事情往往就会一锤定音、毋庸置疑。伊博族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父亲绝对不会对儿子撒谎，这是伊博族人的社会机制赖以运行的伦理基础，“说‘我父亲告诉我’，这可是最重的发誓”（117），因此伊祖鲁深信如果乌姆阿若人拒绝听从自己的劝告，优鲁神不会帮他们“打一场非正义的战争”（20）。村子里的财主诺瓦卡是伊祖鲁的政治对手，他引用另一句谚语来反对伊祖鲁，“智慧就像山羊皮袋，每一个男人都有他自己的皮袋。对这片土地的知识也是如此”（21）。这片土地的历史比乌姆阿若的历史还要古老，换句话说，它在优鲁神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如何来保证优鲁神的祭司所说的话就是真实的呢？诺瓦卡同样是以父亲的名义提供了土地历史的另外一个版本，这块土地原本就属于乌姆阿若，直到白人入侵以后，奥克帕瑞人才敢宣示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诺瓦卡最后认为伊祖鲁之所以不赞成开战，是因为他的母亲来自于奥克帕瑞，“混血的男人往往失去了一颗战斗的心”（22），这可谓是给予伊祖鲁的最致命一击。

二、解构神权：伊祖鲁的伦理困境

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一文中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应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强调文学批评应该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14）。《神箭》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部深刻揭示非洲乡村伦理日趋衰微的小说。返回男主人公伊祖鲁所处的伦理现场，辨析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众多

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对伊祖鲁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正在走向衰落的部族运行机制。

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传统的伊博族土地纠纷并不通过司法程序裁定，而是以宗教的方式解决。理斯曼认为在传统导向型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受到周密而严格的礼仪的控制……文化的一部分为社会的统治和支配提供了礼仪、惯例和宗教”（大卫·理斯曼 244）。在这次纠纷中，伊祖鲁还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他传递了上任大祭司的口训，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宗教裁定再也没有人愿意听了。诺瓦卡一直在和伊祖鲁作对并拒绝承认大祭司的权威，认为应该对大祭司举行两个重要节庆仪式的权力加以严格限制。他对伊祖鲁的权威进行了公开的挑战，“带着神灵的人并不是国王。他只是执行他的神的仪轨，向他献祭。我观察这个伊祖鲁多年了。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想成为国王、祭司和预言者……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优鲁神的祭司把自己当成主人一样凌驾于我们之上。……不管是谁想用优鲁神的名字吓唬我们，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36-37）。诺瓦卡提出了否定大祭司指令的动议，动摇了伊祖鲁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大祭司的意见都是至高无上的，为什么在土地纠纷事件中遭到否决呢？一直以来，在伊祖鲁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巨大的担忧，即优鲁仅仅是一个人为的神，其地位远不如自然神，在噩梦中他曾听见诺瓦卡煽动一大群乌姆阿若的长者，“现在的优鲁神有什么能力呢？……让我们把优鲁神赶走吧，就像阿尼塔人那样！”（197）诺瓦卡的话是极具颠覆性的：既然神是人们制造出来的，那么当神不能实现人类的愿望时，为什么不能被摧毁呢？既然人们自己也可以看见月亮和季节的变化，那么还有必要让神和祭司来做这项工作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探究优鲁神的来源和功能。原来在很久以前，构成乌姆阿若的六个村子是独立的，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而被迫建立了联盟，“他们雇佣了一群强大的药师，为他们请来共同的神灵。六个村子的先辈制造的这个神就叫做优鲁”（20）。优鲁神是联盟的象征，祭司可以传达神的法力，但一切都是人们赋予他的，“代表着团体的精神和权力”（Innes 78）。

随着威胁其生存的其他部族被白人殖民者征服，乌姆阿若失去了维护联盟的动力。特别是在土地纠纷之后，乌姆阿若的实力也被内部的分裂所削弱。温特波特姆上尉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乌姆阿若没有了自卫的能力。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祭司站在白人的一方来对抗自己的族人，从而破坏了乌姆阿若的团结。当诺瓦卡意识到大祭司无法团结族人为土地而战，他作为乌姆阿若的第一个政治领袖要求人们改变对优鲁神的信仰。对此，曾有学者指出，在伊博人的文化习俗中，“当人们对自己所供奉的神不再满意时，他们就会抛弃神”（Kortenaar 1）。

由是观之，伊祖鲁的思想和行为都不符合现代社会以法制为核心内容的

伦理机制对大祭司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要求，因此他无法融入现代社会，也难以界定自我的伦理身份，由此陷入了在两种运行机制的边缘徘徊不定的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指的是“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2）。《神箭》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土地纠纷为中心，描写了宗法制世界与外来者所代表的破坏这种伦理机制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阿契贝清醒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古老宗法制传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他看来，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相比，宗法制部族社会的习俗、精神风貌、思想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和优越性，从而无法抵御外部世界的影响。

三、神之箭：伊祖鲁的伦理选择

《神箭》的叙事横轴是各方势力为土地和声誉而展开的明争暗斗，纵轴是身份认同剧变时期代际间的激烈冲突。正是通过伦理冲突与政治斗争的复杂纠葛，《神箭》真实反映了非洲部族社会的历史变迁，记录了一种正在消逝的古老生活方式——乡村宗法制传统。现代文明的入侵打破了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极大地改变了人的伦理环境，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原先固有的伦理身份和伦理观念。在阿契贝看来，这一艰难的社会机制转型是以人的自我身份的失落为代价的。人们在失去物质和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土地和信仰之后，很容易变得进退无据、无所适从。如果人物不知如何确定自己的伦理身份，便容易使自身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因此，人物在伦理身份发生变化时，必须作出相应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之一，“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268）。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人的伦理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却是被动的，人从出生开始，直至生命结束都在经历着种种伦理选择。对伊祖鲁而言，在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内部矛盾尚未解决之际，一个偶发事件导致的外部矛盾接踵而至。

先从小说的背景来看，《神箭》的故事发生在英国殖民政府推行“卢加德间接统治制度”以巩固其在尼日利亚殖民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20世纪20年代，英国加快了在尼日利亚的殖民扩张步伐，殖民当局深感管理人员之不足，于是采纳了卢加德殖民总督提出的间接统治的策略，就是利用当地的部族上层人物作为代理人来实现殖民统治。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得到部族上层的支持，同时也可以缓解与土著居民的对立情绪。在解决土地纠纷的过程中，殖民当局的行政长官温特波特姆上尉发现伊祖鲁居然能够站在族人的对立面说出真相，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面对必须要执行的政策，他盘算着把伊祖鲁请来，要他接受委任。没有想到的是，派去通知的北方人要威风，把邀请变成了命令，被伊祖鲁断然拒绝。打发信使后，伊祖鲁知道殖民当局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召集族人商议对策。因为害怕白人报复，族人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失去公众支持的大祭司最终身陷囹圄。

在被白人关押了 32 天后，伊祖鲁回到了乌姆阿若，决心和族人进行一场决定性的较量，以此来捍卫自己作为大祭司的伦理身份。但当他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收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的报复心动摇了，希望能和部族和解，即使做不到，也要缩小冲突的范围。当他坐在自己的神庙里，苦思冥想的时候，基督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其他村子的祭司们用他们的神蛇向他的优鲁神进攻。他不能让自己的权威就这样轻易失去，优鲁神也通过梦幻向他发出旨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战斗，而是优鲁神和神蛇的战斗。他再一次成为神的代理人，成为优鲁神弓上的一支箭，向乌姆阿若发起反击。他把报复的时间节点选在了部族最关键的节日——新木薯节，拒绝宣布收获季节的到来。伊祖鲁告诉大家这是按照优鲁神的旨意来规训不服从教规的族人，“毁掉这些人，不是我的意思，让乌姆阿若最小的男人受苦，更不是我的意思，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有时候神灵们把我们当做鞭子一样使用”（257）。

尽管众人一再请求，伊祖鲁仍然拒绝屈服。伊祖鲁的一意孤行使整个部族陷入巨大的混乱状态，因为在伊博族传统中，如果大祭司在节日到来时不宣布，就意味着这个节日没有真正到来。自然的时序更迭没有意义，节日必须通过宗教命名活动才能进入世俗世界系统。在他们看来，伊祖鲁是在滥用他的宗教功能，他的举动不仅没有让民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反而导致乌姆阿若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尽管民众如此愤怒，却没有人胆敢挑战优鲁神的权威。一向敢说敢言的诺瓦卡也被要求闭口不言，因为大家担心引发优鲁神更严厉的报复。他们别无选择，只要眼睁睁地看着木薯烂在地里。最终，这种僵局被白人利用了，他们发现村民们急切地需要获得准许以便收获成熟的木薯，于是传教士创立了一个新的收获季节来取代由大祭司掌管的新木薯节。不再臣服于优鲁神的权威，乌姆阿若人有了新的选择，“不管是谁，只要是不愿意干等着眼巴巴看着庄稼被毁的，就可以带着贡品去找基督徒的神，它会有能力保护他们，而不必担心优鲁神的愤怒”（267）。

由此可见，《神箭》的文本其实包含了一个巨大的创伤性的情感结构，那就是西方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极度扭曲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创伤并不是书中每个人物都能体会到的，被殖民者大都对此习以为常或曰麻木不仁。只有伊祖鲁与众不同，他是书中唯一一个企图与周围的人建立情感交流而又每每失败的人。作为部族的大祭司，伊祖鲁的伦理身份必然要求他在战胜个人创伤经验的同时，还要建构对于传统宗法文化的认同，使传统导向不断内化。然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最终发现人与人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不再建立在亲密的、相互了解的、可以对话的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各种实用的现实考量之上。部族从传统的宗教仪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传统信仰失去了它的号召力，白人的上帝成为部族新的保护者，伊祖鲁本人反而成为一个孤独的被遗弃者。

结 语

《神箭》是对一位与不可逆转的命运抗争、虽败犹荣的“英雄的礼赞”（Lindfors 45），被评论家称之为“阿契贝最好的小说”（Wren 8），阿契贝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卓越的社会矛盾观察者和研究者，他注意到白人官僚机构的膨胀破坏了旧的部族社会结构。随着白人权力向乡村的逐步渗透，原先由首领、祭司维持的乡村秩序让位于代理人所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伦理变迁与部族政治权力，部族由德治、自治转向政治统治，“村社准则、乡规、共享的观念，退出了公共话语空间，甚或不复存在”（李怀印 315）。伊祖鲁固然睿智，但他却无法真正洞悉到部族社会的伦理失序。阿契贝赋予了伊祖鲁悲剧英雄的伟大形象，他用伊祖鲁的疯癫，来震撼那些麻木的被统治的族人，同时也告诫殖民者，自己的民族中依然有着清醒的人，用一己的微薄之力在奋力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意识到非洲文学的整体写实性，阿契贝对社会矛盾的政治、伦理分析源于他对非洲部族文化习俗的洞察，他采用现实主义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非洲历史现实的生动画卷。

【 Works Cited 】

阿契贝：《神箭》，陈笑黎、洪翠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Achebe, Chinua. *Arrow of God*. Trans. Chen Xiaoli and Hong Cuihui.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Huaiyin, Li.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Trans. Sui Yousheng and Wang Shih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蒋晖：《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对钦努阿·阿契贝小说〈神箭〉的分析》，《清华大学学报》6(2015): 60-72。

[Hui, Jiang. “An Af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nversion and Resistance — Review Chinua Achebe’s *Arrow of God*.”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6(2015): 60-72.]

Innes, C. L. *Chinua Achebe*.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0.

Kortenaar, Neil Ten. “Beyond Authenticity and Creolization: Reading Achebe Writing Culture.” *PMLA* 1(1995):1-13.

Lindfors, Bernth. *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7.

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Riesman, David. *The Lonely Crowd*. Trans. Wang Kun and Zhu Hong. Nanjing: Nanjing U P, 2002.]

Wren, M. Robert. *Achebe’s Worl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ovels of Chinua Achebe*. Washington D. 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Inc., 1980.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1980): 77-96。

[Zehou, Li. "Reevaluation Confucius ." *China social sciences* 2(1980): 77-9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Zhenzhao, 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责任编辑：杨革新